
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

〔中〕明

前言：日本日清战争研究的“奇怪的倾向”

我在 1968 年出版的《日清战争的研究》一书中，对日清战争中日本的出兵意图做了如下论述：

日本政府及军部注视着因农民战争而激烈动荡的朝鲜，与其说是对农民叛乱，不如说是对清政府的动静格外关注。如果清政府派兵镇压叛乱的话，那么日本也会立即出兵，凭借多年的准备将清一举压倒，使之成为称霸朝鲜的契机。而且，一旦在朝鲜起事，“对外强硬”派的目光就会立刻转向国外！——当时正值日本国内危机异常高涨之时，专制天皇制的当权者们一定早就等着这个机会呢。（中 明《日清战争的研究》，青木书店 1968 年版，第 110 页）

这一见解是站在研讨和批判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接连发动对朝侵略、对华侵略直至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立场上，即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的立场上得出的。在日清战争过去 100 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即日本军国主义战败过去 50 多年的今天，日本出现了全面否定这一见解的主张。

当然，我现在也不认为自己的上述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做学问要进步就要欢迎批评。但是，下面介绍的现在在日本出现的主张，

是否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观点呢?我个人不这样认为,而把它看成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倾向”。

一 旧日本军及自卫队战史研究者的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周年的 1995 年,出版了通观近代日本战争的《近代日本战争史》(共 6 卷,同台经济恳话会发行,纪伊国屋书店发售)。以曾在旧日本陆军的士官学校、经理学校、幼年学校就读,战后步入经济界的人士为会员的同台经济恳话会(会长濑岛龙三,陆军大学毕业,关东军参谋,曾被扣留于西伯利亚,回国后进入伊藤忠商事会社,后成为该社会长),为纪念该会成立 20 周年发行了此书。其宗旨是所谓“殷切希望本着公正的史实,向国民准确无误地传达近代日本经历过的战争实态,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世”。但是,正如编辑委员长奥村房夫执笔的“前言”中所述,本书的特点在于宣扬“大东亚战争”的“‘本来动机’不是‘占领’,而是以后逐步实行的‘解放’”,以及“日本打破了白人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统治,并向认为白人优越的思想根基发起了挑战”。

该书第一编“第二章 日清战争”的主要执笔者桑田悦(陆军士官学校第 58 期毕业,战后历任陆上自卫队干部、防卫大学教授等职)在季刊《军事史学》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日清战争前日军大陆进攻准备说》的论文(同刊 119 号,1994 年)。桑田在文章中指出,“我国明治二十三年以前的国防政策,虽然也注视着俄英法等欧洲列强对东北亚的侵略,但同时对于北洋水师的壮大感到强烈的威胁,因此基本上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一国政府要采取对大陆的攻势,就绝对必须取得制海权、保证海上的运送力并做好兵站的准备”;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尚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而否定了“日本早就准备对大陆采取攻势,基于对大陆的侵略政策”而发动了日清战争的说法,认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战史研究者原刚也做了题为《从军事角

度看日清战争》的口头报告(1995年6月17—18日,在“日清战争和东亚格局的变化”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并在讨论中说,“日军发动大陆进攻作战是在日俄战争以后,在此之前是以国土防卫为目标的。日清战争中日军苦于人马补给这一点就证明了当时没有在外地作战的计划”,从而否定了日清战争是事先策划好的。

二 高桥秀直、大泽博明等人的“日清开战论”

上述见解是身为职业军人的战史研究者的观点,也有几个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尽管他们的观点有很多不同,但都对以前的日清战争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一)高桥秀直(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研究。高桥在已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1995年出版了大著《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东京创元社,正文531页,索引、年表、文献目录、外务省与驻韩日本公使馆往返电报目录等51页)。

高桥在绪论中谈到写此书的动机。他说,“经过日清、日俄战争而变为大陆国家的战前的日本,最终以战败而告破产。这种对战前日本大陆国家化的否定、批判是战后历史学的出发点,是基本的立场”。然而高桥对此提出疑问,“关于19世纪末期日本近代化和大陆国家化的关系……认为二者不可分的这一见解是否符合事实呢”?换言之,对一向认为从19世纪后半叶到末期向近代化迈进的日本在列强的压迫下,靠侵略朝鲜和中国把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从而完成了近代化(即高桥的所谓“大陆国家化”),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这是无法避免的选择的观点,高桥从根本上提出质疑,并论述了日本走向日清战争的过程。

在第一编“近代化过程中的外交和财政”里,高桥在通观了壬午事变(1882年)以后的日本的对朝政策的同时,以扩军为焦点论述了财政问题。结果总结出以下3点结论:

1. 以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长州派为主流的日本政府的对朝

政策,并非即使与清相争也要独霸朝鲜,对清朝一贯是想避免战争的。这与日清、日俄战争后的外交路线、即以维持和扩大在大陆的政治支配权为基本目标的外交路线不同,如果将后者称为大陆国家型路线,则前者当属非大陆国家型路线。

2. 关于军备政策,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对抗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这是出于对清朝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而并非是积极地图谋与清对战。它是准备对付万一发生的事态的,只要日清间的悬案未解决,就有可能发生不测。

3. 关于财政政策,也与以前通行的说法,即把侵略大陆作为外交目标而采取了扩军至上的财政路线的说法不同,认为日本政府是本着“非大陆国家型小政府”的路线推进日本近代化的(同书,305—306页)。

基于上述结论,高桥写道,“从初期议会期的明治国家的形态以及在此以前走过的路程中,看不出有和日清战争相关连的迹象”。高桥全面驳斥了在以前的日清战争研究中大多数人的见解。

但是为什么1894年夏天爆发了日清战争呢?高桥在第二编中做了题为《日清战争的开战过程——1894年夏》的论述。

在第一编结论的基础上,高桥写道,“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与主张和清朝武力决战的外相陆奥宗光及陆军将领相反,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514页),尽管如此,“日本为什么还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呢?”他认为,“其理由是6月15日伊藤改变了他的方针……发生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不在伊藤对朝政策的变化,而在内政”,“出兵以后,议会各派及舆论界叫喊对外强硬论,给政府施加了压力……将派遣出的大规模部队撤退回来在内政上是有困难的,但不撤回又会招致对清的武力决战。伊藤被迫在撤兵——对清协调和留兵——与清对决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结果还是选择了后者。当时政府正临近大选,因而不得不对各政党及舆论界的动向非常敏感”(514页),日清战争开战的主要原因,完全在于日本的内政。这就

是高桥关于日清战争开战原因的结论。

对于 550 余页的大著来说,我认为这未免是过于“贫乏的结论”。

(二)大泽博明(熊本大学法学部)的研究。他虽然和高桥有些不同,但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的出兵决定)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案提示也不是要对清朝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并指出,“从全局来讲,对清开战是起初的政策目标失败的结果,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和日清开战》,《熊本法学》,1993年,第3页),“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也不存在什么冷静的形势分析及不断采取切实的手段以达到目的的所谓现实主义外交的‘陆奥外交’……那只不过是《蹇蹇录》所反映的史观”(同书,第48—49页)。

大泽在同一旨趣下还写了《天津条约体制的形成和瓦解》(一)、(二)(《社会科学研究》43—3、4,1991年)、《伊藤博文和日清战争之路》(同刊44—2,1992年)、《明治外交和朝鲜永久中立化构想的展开——1882—1884年》(《熊本法学》83,1995年)等几篇论文。

三 斋藤圣二的军事史研究

持上述见解的人们,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立场多种多样,其观点也有一些不同。但是总体看来,他们都认为日清战争是由于偶然因素而爆发的无计划、无预谋的战争,日本政府出于内政原因,或者说是偶然的阴差阳错,才不得不开始了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以高桥、大泽为代表的上述主张,尤其在充分强调军事观点、

综合论述事态推移这一点上,有着明显的不足。而且,只强调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侧面并以此做为自己的主张的基干,我个人完全不认为这样就可以全面地清楚地解释日本为什么走上了日清战争的道路。

与上面介绍的观点相对,以军事视角为主轴的斋藤圣二(西昂短期大学)的研究引人注目。斋藤是研究成为第一代朝鲜总督的日本陆军最高将领之一寺内正毅的,他写了《关于陆军对日清战争的准备》(西昂短期大学《创造》24,1995年)一文,对日清战争的开战和日本陆军的动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寺内正毅在日清战争开战时,作为参谋本部第一局长主要担任日军输送方面的任务。斋藤从寺内的《日记》以及日清战争中最先出兵的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的有关文书等资料中,逐步搞清了日清战争开战时日军、特别是陆军的动向,及陆军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情况。

斋藤还论述了日军的“派兵目的”表面上也是“保护日本人及公使馆”,而背后的目的是“与清争夺霸权”,这是无论哪一个决策者都明白的。向争端地区派遣重武装的大军,假如没有搞军事冲突的决心,是不可能走出这一步的,从而论证了上面一、二两节中的各种见解是不能成立的。

四 参谋本部海军部的对清“作战构想”

(一)为列举日本从日清战争之前就早已开始准备和中国进行战争的例子,我想介绍一下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所藏的参谋本部海军部有关作战构想的史料。

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里收藏了6份和中国进行战争的作战构想,它们是:

1. 《征清方策》(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1887年12月30日)

2. 《对策》(海军少佐岛崎好忠, 1887年12月)
3. 《对策》(海军大尉三浦重乡, 没有日期)
4. (无题)(海军大尉日高正雄, 1887年12月30日)
5. 《阐述对策意见》(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 1887年12月28日)
6. 《对策》(浪速舰长海军大佐矶边包义, 1888年4月20日)

以前, 作为日清战争前日军具体的对清作战构想, 引人注目的是1887年2月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起草的《征讨清朝方案(清国征讨策案)》(参照《日清战争前的对清策略》, 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 严南堂书店1995年版)。

关于上面列举的6个作战构想, 田中宏已在《日清两国对立和开战的轨迹》(前掲《近代日本战争史》第一编所收)中提到了标题, 但是还没有论述其内容和历史意义的文章。

上述6个作战构想的执笔者, 在起草该构想的1887年, 除了矶边包义是常备小舰队“浪速舰”的舰长以外, 其他5人都属于参谋本部海军部。樱井规矩之左右是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二局第一科科长, 由于科长出差在外, 他处于代理科长的地位。岛崎好忠是该部第二局第三科的科长, 三浦重乡是第二局第二科科长, 日高正雄和佐佐木广胜都是第三局第一科的科员。

顺便提一下, 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二局掌管海军出师, 同局第一科担任出师计划, 第二科负责沿岸防御。另外第三局主管外国谍报, 第一科负责欧美谍报(参照有贺传:《日本陆海军情报机构及其活动》, 近代文艺社, 1994年, 67页)。

还有, 上面6个文件除一个“没有日期”以外, 其余有4个起草日期集中在“1887年12月”。这一事实值得注意, 这和前面提到的小川又次的《征讨清朝方策(清国征讨策案)》是在1887年2月的事实一起, 说明在1887年, 参谋本部预测到和中国的交战, 并有组织地讨论过作战构想。

(二)关于上述6个作战构想,总体内容是以攻击渤海湾、并进攻北京为中心的。对所有这些作战构想都有必要进行分析,但在这里仅就樱井的《征清方策》介绍一下其要点。

担当制定海军出师计划的中枢要职的樱井规矩之左右构想的此《征清方策》,首先把海军舰队分成第一、第二及炮舰队三支舰队,第一舰队、炮舰队加上陆军的混合部队,组成“先头部队主力”。这个“先头部队主力”的任务,是攻破中国的北洋舰队和旅顺军港,使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变成日军进攻北京的第一根据地。第二舰队作为“先头部队支队”,其任务是防御中国的南洋舰队,确保通往中国的海上交通,解除日军进攻北京的后顾之忧。

在初次进攻达到金州半岛为据点的目的以后,后续的大部队便在直隶省抚宁县、洋河口附近登陆,调整态势发起对北京的进攻,这便是樱井的作战构想。

樱井记述了首先攻打旅顺的理由,即金州半岛和山东半岛以及众多的岛屿构成了渤海湾的自然门户,中国海军倚旅顺、威海、芝罘三港鼎足而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航行于渤海湾的日本船舰的安全,就必须先攻打旅顺。海军舰队和陆军共同作战的理由是,从日、中海军的比较来看,日本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让陆军登陆,从背后攻打中国炮台,支援舰队。

樱井的作战构想中没有设想日中在朝鲜的冲突,这一点与实际发生的日清战争的过程不同。但在日清战争的实际过程中,日军也攻占了包含旅顺在内的金州半岛,然后攻打了山东半岛,并且陆海军共同作战攻打了威海卫。还在1895年3月,日军决定进攻中国本土时,天皇自己就热心地主张把大本营扎在旅顺,然后移到洋河口。这表明在日清战争过程中,日军实际考虑过在洋河口附近登陆、占领,以此作为攻打北京的据点。

从日清战争的实际作战过程也能看出,樱井的《征清方策》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运用于日清战争的实战之中。

结语——今后的课题

以上,介绍了现在在日本出现的日清战争研究的一种倾向。高桥和大泽等人的研究,乍看起来似乎很精密,但实际上,他们的考察中欠缺包含军事方面在内的综合视角,只停留在极为观念性的议论上。如果包含军事方面在内进行综合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能否定日清战争是以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为契机的。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交战的时机并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间的交战,至少从 1887 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

就高桥秀直、大泽博明等人的研究,我准备发表文章进行全面的批判。值此也痛感有必要推进在日本一直被忽视的日清战争军事史的研究。

(作者为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